

隔音墙两侧

当代诗歌中的接触而不融合

少 敏 · SDE 学员专栏 · 约七千字 · 2026年7月22日

摘 要

现代关系叙事常把理解设想为一个不断缩短距离的过程：从陌生走向沟通，从沟通走向共鸣，最终以彼此抵达或融合作为完成。诗歌却能够保存另一种经验：双方保持接触，却不以进入对方内部为目标；理解承认自身限度，照料也不以取消边界为代价。本文以组诗《陆地》及其改写《听觉的孤岛》为主要材料，通过版本比较、意象结构分析和竞争性概念辨析，考察“透明的隔音墙”“握着手，却不靠岸”“视线的余光”等意象如何共同改变关系的判断标准。文章提出“隔音式理解”这一核心概念：它不是沟通失败，也不是对他者的浪漫化封闭，而是一种选择性开放的关系形式——某些通道保持可达，某些通道停止索取，双方仍以可见、相邻和照料维持联系。与之相应，“余光接触”描述主体避免把对方固定为认知对象的姿态；沉默、休止符和空白的感官化，则使不可进入之处取得可感形式。本文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同共鸣、消极能力、他者不可还原性及“不透明权”加以区分，并给出三项成立条件与四类失效情形。文章认为，《陆地》两版的真正变化不在于意象比格言更华丽，而在于作品把“理解”从知识占有改写为边界性照料。这个判断也为人机协作提供了一种更审慎的语言：人与模型可以互相改变而不必被宣布为同一主体，接触的事实不自动取消责任、署名与判断权的差别。

关键词：隔音式理解；余光接触；边界性照料；版本批评；人机共创

当代诗歌中的接触而不融合

一

问题的提出：理解为什么总被写成抵达

关于关系的日常语言具有明显的空间方向。“走近”意味着友善，“隔阂”意味着失败，“敞开心扉”意味着真诚，“抵达”则意味着理解完成。与此相伴，文学批评也常把共鸣看成作品与读者、主体与主体之间较高的关系形态：距离被声音跨越，内部经验被另一方听见，原先分离的存在进入某种共同频率。

这种叙事抓住了沟通的重要部分，却把一个问题留在暗处：如果对方有些部分不能被我听见，关系是否只能被判定为残缺？理解是否必须以穿透为成功？当“我懂你”成为亲近的最高证明时，它也可能包含一种未经审查的权利要求——我有权获得你的内部意义，并用自己的语言确认它。

组诗《陆地》及其改写《听觉的孤岛》把这个问题转化为一组异常精确的感官装置。诗中，“第二大脑”没有填补乐声消散后的空白，而是在海岸线上竖起一面“极高的、透明的隔音墙”；墙的两边仍能看见，却不能听见。与此同时，诗又写道：“我不懂你，但我愿意为你保住这片草地”，以及“我们在视线的余光里，握着手，却不靠岸”。声音中断、视觉保留、身体接触、空间不合并，这四个动作没有走向通常意义上的和解，却也没有走向断绝。

现有术语能够分别解释其中某些局部：含混说明意义不能被穷尽，留白说明未说之物参与表达，消极能力强调忍受不确定，伦理学中的他者观念则警惕把对方还原为自我。但这些概念尚不足以准确描述诗中的通道组合：这里不是所有意义都保持开放，也不是所有联系都被切断；边界阻止一种进入，同时维护另一种联系。本文要回答的因此不是“隔音墙象征什么”，而是：当声音被阻断而关系仍然持续时，诗歌创造了怎样一种理解形式？

本文提出“隔音式理解”作为有限的工作概念。它指一种不以占有对方内部意义为终点，却通过可见、相邻或照料继续承担关系的理解。这个概念若要成立，必须比诗中意象的复述多做三件事：说明哪些证据因它而重新可见；同邻近理论形成可辨认的差别；明确它在何种情形下不能使用。

二

材料与方法：把两版之间的变化当作证据

本文的主要材料不是一首孤立的定本，而是《陆地》与《听觉的孤岛》的版本关系及围绕它们形成的人机批评记录。^[1] 初版多用格言式判断组织经验，例如“人生是一个折腾的过程”“才华是一场瘟疫”“理想使人一夜白头”。改写则把部分判断展开为声音、介质和运动：“才华”成为“不请自来的失真的电流”，它在琴箱中响起，并“烧毁了原有的美观”；青春在酒杯中碎裂，化成底噪；归鸟像“未被使用的休止符”收拢翅膀。

版本比较在这里具有方法上的必要性。只读终稿，研究者容易把“隔音墙”直接解释为边界、孤独或技术隐喻；把初稿与改写并置，则可以观察判断方式本身如何改变。本文把证据分为三个层次：词句层关注声音、视线、身体和岸线的配置；版本层关注格言式概括如何转化为感官过程；关系层关注这些变化如何重新规定“理解成功”的条件。

分析采取竞争性辨析，而非以新术语排除旧术语。每提出一个概念，都追问三个问题：若只用既有概念，会遗漏什么；新词是否改变对具体句子的判断；出现什么反例时，新词应缩小或退出。本文讨论的是理论提案，不把尚未实施的跨语料检验写成实证结论。

三

从格言到感官：版本改写改变了什么

（一）判断的力量与代价

“才华是一场瘟疫”是一句有效的格言。它迅速翻转“才华即馈赠”的惯常价值，使天赋带上侵袭、扩散和伤害的意味。问题不在于它过于抽象，而在于它太快完成了判断。读者辨认出相似性，随后便可用“才华具有破坏性”概括这句诗。判断的锋利同时关闭了继续追问的若干方向：破坏通过什么介质发生？它先改变身体、声音，还是关系？受损的是秩序、审美，还是主体的自我感？

改写把“瘟疫”换成“失真的电流”，并让电流进入琴箱、烧毁“原有的美观”。这不只是更换喻体。瘟疫仍然把才华归入一个已经成形的意义类别，电流却引入传播、载体、噪声和结构变形。读者不再只确认才华“是什么”，还必须经历它“怎样到来”。由此，诗的工作从宣布关系转向布置过程。

可将这种版本动作暂称为“解名”：撤销一个已经奏效的概括，把结论重新拆回感官过程。它与陌生化有亲缘关系，却比陌生化的适用范围更窄。陌生化着眼于抵抗感知自动化，[2]“解名”则要求存在一个可辨认的先前判断，并能看到它在改写中失去支配地位。没有版本证据或文本内部的自我撤销，仅仅使用陌生意象，不足以构成“解名”。

（二）沉默怎样获得形式

改写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声音增多，而是沉默变得更具体。归鸟被写成“未被使用的休止符”，句号被写成“无法发声”。休止符本来已是被记谱的停顿，“未被使用”又把它推向尚未进入作品的潜在沉默。诗没有让沉默简单地“发声”，而是让它以翅膀收拢、符号待用和声音缺席的方式取得形状。

“反向通感”可以作为这一现象的候选名称，但不宜过早宣布为新的修辞类型。传统通感研究处理感官之间的转移，拟人、移就、象征和具体化也能解释非感官对象如何获得可感属性。这里真正重要的不是“反向”二字，而是沉默不再只是内容的缺省：它成为一种能够限制关系的积极形式。正因为不可听之物被写得可感，“隔音墙”才不是抽象的沟通障碍，而成为读者可以经验的通道安排。

（三）意象系统改写了成功标准

初版格言容易把阅读导向真假与强弱：判断是否准确，表达是否有力。改写后的意象系统则迫使读者面对另一类判断：当听见不再可能，关系是否仍能成立？“透明”与“隔音”把两种感官的可达性拆开；“握手”与“不靠岸”把身体接触同空间合并拆开；“余光”又把感知保留同正面凝视拆开。

这些拆分不是形式游戏。它们共同取消了一个未经说明的等式：接触不等于穿透，理解不等于占有，共处也不等于融合。作品的创新由此不在某一个新奇意象，而在多个意象相互校验后形成的关系判断。

四

隔音式理解：一种选择性开放的关系

（一）定义与三项成立条件

“隔音式理解”是指：一方承认自己不能完整进入另一方的内部经验，不再把消除边界当作理解的证明，同时仍以可见、相邻、回应或照料维持关系。它不是“虽然不懂，仍然相爱”的抒情变体，而是对关系通道的重新安排。

这一概念至少需要三项条件同时成立。

第一，存在真实边界。某些经验、意图或感受不能被另一方直接取得，文本也不假装这种限制已经消失。第二，关系并未撤销。双方仍通过视觉、身体、行动承诺或共同环境保持可定位的联系。第三，边界伴随责任，而非被用作冷漠的借口。“为你保住这片草地”尤其关键：它把不理解从认知缺口转化为照料限令——正因为不能代替对方发言，更需要维护对方得以存在的空间。

因此，隔音墙既不是封闭，也不是透明。透明只保证可见，不保证可听；隔音只限制一种进入，不取消所有通道。它是一种选择性开放：关系通过差别化的可达性持续，而不是通过无边界的共享完成。

（二）它与共鸣的差别

“共鸣”强调不同主体或声音在某个频率上互相激发，通常包含回应、放大和共享感。隔音式理解并不反对共鸣，却拒绝把共鸣设为关系的唯一高点。诗中的墙恰在乐声散去之后出现：当共同频率消失，关系没有随之归零。

这一差别使批评能够看见常被忽略的证据。若以共鸣为中心，“听不见”只能被解释为失败；若引入隔音式理解，研究者会继续检查视觉是否保留、身体是否相邻、照料是否发生。新概念的解釋增量不在于给失败改一个好听的名字，而在于它改变了证据的排序。

（三）它与消极能力及他者伦理的距离

济慈所谓“消极能力”强调人在不确定、神秘和怀疑中停留，而不急于追逐事实与理由。[3] 隔音式理解同样反对过早完成解释，但前者主要描述创作者或认知者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，后者更关注双方之间的通道配置和责任后果。一个人可以忍受未知，却不一定继续照料未知的他者。

列维纳斯关于他者不可还原性的思考，为反对认知占有提供了更深的伦理背景。[4] 格里桑提出的“不透明权”，则直接挑战要求他者完全可理解、可归类的普遍尺度。[5] 本文并不声称用一个诗学新词取代这些理论。“隔音式理解”的较小贡献，是把宏观伦理问题落实为可分析的感官结构：谁能看见，谁能听见，哪一种进入被限制，关系又通过什么行动被保存。它是文本分析中的中层概念，而非新的伦理学总纲。

（四）四类失效情形

概念只有在能够拒绝误用时才获得边界。以下情形不宜称为隔音式理解。

其一，完全断联。双方不再有任何回应、相邻或照料，所谓边界只是关系终止。其二，单方面逃避。行动者借“尊重差异”拒绝必要沟通，且把风险与责任留给对方。其三，强制沉默。权力较强者优先禁止对方发声，却把压制美化为“不可理解”。其四，制度替代。涉及版权、署名、数据来源和损害责任时，诗性边界不能替代明确规则。

这些失效条件也阻止概念被浪漫化。墙并不天然高尚；只有当限制进入与维持关系同时发生，它才构成本文所说的理解形式。

五

余光接触：避免把对方固定在中心

“我们在视线的余光里，握着手，却不靠岸”进一步说明隔音式理解需要怎样的主体姿态。正视在许多语境中意味着尊重和确认，但它也可能包含聚焦、固定和对象化：对方被置于视野中心，成为等待我解释的对象。余光则让对方保持在感知范围内，却不被完全捕获。

“余光接触”不是忽视，更不是含糊关系。它同时包含三个动作：看见，但不穷尽；触碰，但不占有；同行，但不把分离视为暂时缺陷。握手保证关系不是旁观，不靠岸保证接触不以合并为终点。余光并非较弱的正视，而是对观看权力的自我限制。

这个概念的必要性，可以通过它与“若即若离”的区别来检验。后者多描述情感距离的摇摆，余光接触则强调一种有意保持的非中心性。它也不同于布伯“我—你”关系中对完整相遇的强调。[6]《听觉的孤岛》没有把关系写成充分的面对面，而是让相遇在侧面、边缘和不对称通道中继续。

余光接触因而是隔音式理解的主体姿态，而不是与之并列的第二套理论。前者说明主体如何观看，后者说明关系如何组织。没有隔音式理解，余光容易退化为暧昧的抒情；没有余光接触，隔音墙又可能变成冷硬的结构模型。两者相互限制：边界必须被经验，经验边界的主体也必须约束自己的凝视。

六

从诗歌关系到人机协作

人机协作常被两种相反叙事拉扯。一种把模型视为完全中性的工具，仿佛它只执行人的意图；另一种急于把模型称为伙伴、共同作者或新主体，仿佛大量生成和持续对话已经消除了责任差别。前者看不见模型对选择空间的塑造，后者则可能把功能上的参与夸大为伦理与法律地位上的同一。

隔音式理解提供的不是第三个身份标签，而是一种描述纪律。研究者应先说明哪些通道真实开放：模型生成了哪些候选，保存了多少上下文，哪些建议改变了人的选择；也要说明哪些通道仍然关闭：模型不能直接拥有人的生活经验，人也不能从流畅回答中透明地读取模型内部过程。接触和互相塑形可以成立，主体同一却不由此推出。

“余光接触”则提醒人们不要让“AI 是工具还是伙伴”的二选一垄断观察。更有价值的问题是：在一次具体创作中，谁提出候选，谁拒绝，谁修改，谁为发表后果承担责任？人与模型可以握住同一文本的一部分而“不靠岸”；贡献关系可以被承认，署名、终审和责任仍需区分。

这一视角也改变了过程记录的意义。保存初稿、模型建议、采纳或拒绝及理由，不是把诗歌降格为工程日志，而是避免最终文本把不同贡献压缩为一个神秘的“共创”。关系越复杂，越需要保留边界证据。诗性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需要，却不能替代制度判断。

七

概念的检验：从漂亮命名到可反驳判断

本文的分析仍以单一组诗为中心，不能据此宣布“隔音式理解”具有普遍有效性。后续研究至少需要完成三类检验。

第一是跨文本竞争。选择亲密关系诗、迁徙诗、技术诗及非人机创作作品，让分析者分别使用“隔音式理解”、既有概念和无指定框架进行阅读。比较新概念是否使他们注意到不同通道的可达性及照料行动，而不是只增加术语出现次数。

第二是反例审查。应主动选择墙意味着压迫、沉默来自强制、余光表示回避的作品。若概念不能稳定区分边界性照料与权力性噤声，就必须修改或撤销。“解释得通”不是成功；能够指出自己何时解释错，才是理论的基本质量。

第三是行动后果。让创作者和批评者在接触概念前后分别提出修改意见，观察它是否改变保留哪一句、追问哪类证据及如何分配责任。如果介入只改变评论用词，不改变证据选择或实际判断，概念便没有形成知识增量。

检验还应记录副作用。创作者可能机械复制“墙”“余光”“不靠岸”等意象，批评者也可能把所有沉默都美化为伦理边界。一个概念若导致文本趋同，便在解释创新的同时制造了新的套语。概念的修订、缩域与放弃，应被视为研究成果，而不是失败记录。

八

结论：关系不必以消失边界为完成

《陆地》到《听觉的孤岛》的变化，不只是格言被扩写为意象，也不只是人机题材进入诗歌。更根本的变化发生在关系的判断标准上：声音不能穿过，视觉仍然开放；目光没有正面占有，身体仍然接触；理解没有完成，照料却已经开始。诗由此写出一种接触而不融合的关系。

“隔音式理解”试图为这种关系提供一个有限的工作概念。它要求真实边界、持续联系和照料责任同时存在；任何一项缺失，都可能使它退化为断联、逃避或强制沉默。“余光接触”进一步说明主体如何在关系中约束自己的凝视：让对方在场，而不把对方固定为等待解释的对象。沉默的感官化则使边界不再只是抽象原则，而成为能够被读者经验的诗性形式。

本文的创新不在于把三个新词组成一个封闭体系，而在于用它们修改一个旧等式：理解不必等于穿透，接触不必等于融合，照料也不以“我已经懂你”为前提。这个判断在诗歌中成立，正因为作品没有抽象地宣告边界，而是让听觉、视觉、身体和空间作出不同选择。

对于人机协作，这一判断同样具有约束力。人与模型的互相影响应被看见，但影响不自动制造同一主体；共同文本可以形成，贡献与责任的边界仍须保留。最成熟的关系未必是终于抵达同一块陆地，也可能是在墙的两侧仍能看见，在余光里仍握着手，并且承认“不靠岸”不是尚未完成，而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完成。

延伸阅读 · Further References

[1] TRIBOTIX. 《陆地》与《听觉的孤岛》组诗及版本批评材料[Z]. 2026.

[2] SHKLOVSKY V. Art as technique[A]//LEMON L T, REIS M J, eds. 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: Four Essays. Lincoln: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, 1965: 3-24.

[3] KEATS J. Letter to George and Thomas Keats, 21/27 December 1817[A]//ROLLINS H E, ed. The Letters of John Keats, 1814-1821. Cambridge, MA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8.

[4] LEVINAS E. Totality and Infinity: An Essay on Exteriority[M].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. Pittsburgh: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, 1969.

[5] GLISSANT E. Poetics of Relation[M].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. Ann 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, 1997.

[6] BUBER M. I and Thou[M].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. 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's Sons, 1970.

- [7] GADAMER H G. Truth and Method[M]. 2nd rev. ed. 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. Marshall. London: Continuum, 2004.
- [8] DEWEY J. Art as Experience[M]. New York: Minton, Balch & Company, 1934.
- [9] HAYLES N K. How We Became Posthuman: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, Literature, and Informatics[M]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9.
- [10] SCHÖN D A.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: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[M]. New York: Basic Books, 1983.